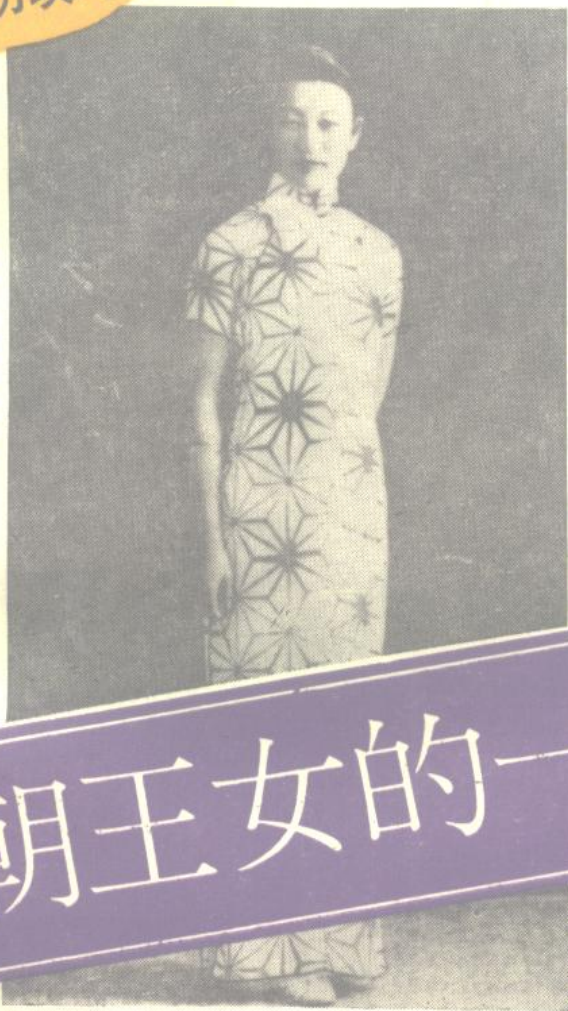


自传情真
经历坎坷

爱新觉罗·显琦著

陈喜儒等译



清朝王女的一生

清朝王女的一生

——中日之间

爱新觉罗·显琦著

陈喜儒等译

作家出版社

清朝王女的一生

作者：爱新觉罗·显琦

译者：陈喜儒 徐 前 金默玉

责任编辑：周 坤

责任校对：李超英 祁 斌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通县教育局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38千

印张：6.75 **插页：**2

版次：198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105-9/I·104

定价：1.9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所认识的显琦女士

上坂冬子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肃亲王——本书作者显琦的父亲，是清王朝最后的亲王。当清王朝覆灭时，肃亲王率全家三十五个子女亡命旅顺。小丘上，一座潇洒的红砖瓦房组成的院落是他们当时的宅邸。那里原本是一家俄罗斯旅馆，据说后来成为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夫妇于满洲国建国前也曾在那里住过。这所房屋现在恐怕仍在原处，只是由于旅顺不是观光之地，所以游客们难得一睹这所建筑物的风貌。

肃亲王亡命旅顺后，又生了三个孩子，成为三十八个孩子的父亲。肃亲王除有正妃之外，还有侧妃四人。昭和初期无人不晓的男装美人、日本关东军的走狗——川岛芳子，为他第四位妃子所生。现在，她的兄弟姐妹大多已不在人世了，如今依然健在的一奶同胞的王女，只有本书的作者显琦了。

我以川岛芳子为中心，进行采访始于四年以前（一九八二）。芳子的同胞长兄早已加入日本籍，家住东京郊区。由于他与川岛芳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所以我从他那里

得到了不少宝贵材料。但是，我是一个女人，所以我更想得到她的姊妹的证言。这就是我对其胞妹产生兴趣的原因。

四年前的中国，远不象现在这样自由。在热心人的帮助下，我通过各种渠道，终于了解到川岛芳子的侄子和表兄弟们如今仍然散居在北京市内。但向我提供这些情况的人都说：

“可能谁也不会接受你的采访。提起川岛芳子，在人们的印象中，永远是一个身穿日本军服，男装打扮，效忠帝国主义的女性。她的亲属，有不少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仅仅因为与她有血缘关系，就遭受了数不清的劫难。所以现在他们恐怕听到她的名字都会心惊肉跳，她妹妹更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去采访她，也许一开口就会把你轰出去。”

显琦的家在北京城郊一片新兴的住宅区内，从市内坐出租车大约需要三十分钟。这次访问本身就已经够让人紧张的了，再加上语言不通，只能靠着一张写着住址的小纸片，请求司机帮助寻找，搞得我精疲力尽，狼狈不堪。当我终于找到她的家，站在门口时的刹那间，甚至想干脆回去算了。在我重新振作精神推开门时，竟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她主动问道：

“你是上坂女士吧？”

语调是温和的。毫无疑问，这位心直口快，身穿长裤的妇女就是川岛芳子的亲妹妹，她们姐妹长得虽然不很象，但气质却大致相同。

显琦能一下叫出我的姓名，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她很喜欢读书。

在她两间一套的公寓里，摆满了日本的新刊图书，我所

写的《庆州拿撒勒》、《被遗弃的妻子》等也陈列在其中。她曾留学日本，在学习院读过书，因此在她的同窗好友中，肯定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多。大概有不少日本人在与她交往的过程中，也想起了在旅顺、大连度过的那些岁月。书架上陈列的日本新书象征着来自日本的友情。后来得知，不仅过去的同窗好友，就连富士银行原总经理岩佐凯实先生、已故亚洲调查会会长田中香苗先生等也很怀念她，曾向我询问过她的消息。显琦交游之广，简直令我吃惊。

这些暂且不论，对于我的突然来访，她和颜以待的另一个原因是，不知什么时候，她已从亲友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我为了写川岛芳子传记到处奔波的消息。这恐怕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捕捉情报的能力吧。

“亲戚们大概谁也不愿意开口讲什么，但我跟他们不一样。不过，你既然决心要写，那就肯定能出版，我应该尽量协助你，让书中写的事情尽可能真实一些。对于我来说，有关芳子姐的事情决不是我所喜欢涉及的话题，而且因为我和芳子姐年龄相差较远，所以有关她的详细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我愿尽我所知，把一切都告诉你。”

显琦这番话使我放心，也令我感动。同时，我也知道，现在谈论芳子的事情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所以我又说：

“我一定注意不因这次采访给你带来麻烦。”

意外的是，她听了我的话立即反驳说：

“不必为此担心，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虽说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我是经过了十五年的监狱生活和七年的强制劳动，才回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我

是曾经生活在人世间最底层的人，如今好容易才得到了做为一个普通人的权利，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即便错了，也不过是重新回到那种生活中去罢了。哈哈……”

这伴着笑声的感慨，使我刹那间放弃了了解有关川岛芳子情况的念头。作为清朝的王女，诞生在亡命之地旅顺，成人后留学日本，在中国动乱的年代里，迎来了女性的青春年华。随后，又经历了‘文革’、监禁、强制劳动等等。今天，当中国终于展开自由的双翼起飞时，她已步入暮年。在她的心中一定秘藏着许许多多不同于芳子的生活片断。那将是些普普通通、断断续续的琐事，而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记。但那是活着的历史见证人的经历，它的真实性具有值得采访并公诸于世的价值。如果她同意，我愿意代笔为其做传。然而，当我提出这一想法时，显琦神情一变，说道：

“我一直想将我的人生记录下来，我不需要任何人代笔。我讨厌采用对话的形式，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不管写好坏，我都想自己写，用自己的手记下自己的人生。做为活的见证，我要亲手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否则，我死也不能瞑目。”

一番话，显示了惊人的气魄。据显琦自己讲，她原有一副很好的嗓子，如今变得这样沙哑，是由于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挥锹干活，却得不到一口水喝所造成的。她说：肯定是在那样特殊的条件下，喉咙的细胞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原来的嗓音。

当然，由本人来写是最好不过的了。况且连喉咙细胞的

变化都体验过了的人，如果说要自己来写的话，多余的协助反而有碍于她的工作。对她的想法，我表示了支持。告别显琦，我回到了日本。

不久，她连续不断地寄来了手稿。可能是为了节约吧，在航邮用的很薄很薄的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钢笔字，几乎没有一点空白，读起来可真困难。不过，文章中那种不可思议的豁达豪放，很快吸引了我。读着读着，我仿佛看到了她伏在那两居室房间的床上，飞快写作时的表情，我仿佛看到了为了她而在厨房中忙碌的她那在劳改农场时结为夫妻的丈夫的身影。

她继续将手稿寄给我，但并非期待着什么。只是因为想写，所以写了，而因为写了，所以想让我看一看。她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说单纯确实单纯，说旁若无人也确实旁若无人，我没有因为她写得很有意思，而想拿给出版社去看看的想法，也不大会关心别人。这册书之所以得以诞生，是因为一位常到家中来的编辑注意到了那沓厚厚的航空信札。

如今重新回顾一下这本书产生的全过程，我心中不禁升起这样一种感觉，是她挣脱不幸命运的魄力，或者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妖气促成了事情的发展，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果。

我认为作为一本完整的读物，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作为一本描写个人经历的读物，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不可思议的活力。

目 次

DB35/14

我所认识的显琦女士.....上坂冬子 1

序 章	停战后的北京.....	1
第一章	父亲的葬礼.....	10
第二章	旅顺的回忆.....	16
第三章	姐姐川岛芳子.....	24
第四章	学习院的生活.....	31
第五章	回国，停战前的北京.....	39
第六章	开设家庭食堂.....	42
第七章	结 婚.....	55
第八章	北京编译社.....	72
第九章	被捕之夜.....	95
第十章	十五年徒刑、离婚.....	136
第十一章	农场生活、再婚.....	160
第十二章	北京的新生活.....	202

后 记..... 205

序 章

停战后的北京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九四五年八月时北京的情景，波茨坦宣言的公布，宣告了日本的失败，北京的日本人也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朋友们说：“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了。”我同情无辜的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但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我出生在帝王之家，是清朝八大亲王之一肃亲王最小的女儿。清朝虽早已灭亡，父亲也已告别人世，但今后等待着这封建没落贵族之家和我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我一无所知。

不久，国民党兵、美国兵和头戴白色钢盔的军事警察取代日本兵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从东单到北新桥的道路两侧，拍卖着日本人遗弃的日用品、和服、衬裙等杂物。看着这情景，一种说不出的凄凉之情油然而生。

以前被勒令停止的各种娱乐机关：舞厅、美国电影、酒吧等，相继重新出现，大街上乱纷纷一片，正经人家的闺女连门都不敢出，藏在家里。

我们兄妹从自己家中搬到了东单的新居。那是套很大的院落。大哥宪立的妻子是日本人，哥哥怕牵连其他兄弟姐

妹，所以决定搬家另居。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和芳子姐吵了一次。当时，我们还没有搬家。她就是命运起伏、后作为“东洋的玛塔·哈利被处以极刑的女性——川岛芳子。”芳子生为清朝王女，后被日本人川岛浪速带去做了养女。玛塔·哈利是荷兰女间谍，川岛芳子也因在中日战争中具有日本间谍之嫌，最后被判处死刑。芳子比我大十三岁，和我是一母所生的姐妹。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后，芳子姐曾几次叫我与她同住，但因我看不惯她周围的那些人和她本人的所作所为，所以拒绝了她。为了尽量不和她见面，我每天都呆在亲戚家。也许这件事惹恼了她，有一天，她以照顾她生活的日本人——绪方八郎的名义给我送来了一份情书。对她这一眼即可看破的卑劣手法，我自然十分气愤。我们姐妹之间，从此产生了明显的裂痕。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到她的家中去了。这件事过后不久的一天，她突然带着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闯进我的屋子，拔出军刀，大发雷霆，让我向她赔礼道歉。我自认为没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所以对她说：“你有什么话，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讲嘛。”她一听，更加恼怒，骂道：“我没你那么有学问，你大概是从嘴生出来的。怎么，想把我当傻瓜吗？”说着，动手砸起玻璃柜、玻璃窗来。正屋的人们听到响动吓了一跳，全都跑了过来。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喊叫，她认为用军刀打我，我会大声喊叫的，因为我不出声，只是冷冷地看着，所以她就打得更欢了。但是她并没有多大劲儿，打了我两下子就没有力气了。

一会儿，佣人大声报告说，“十九爷（我同母的第五个

哥哥)回来了。”她听了一愣，停了下来。“干什么呀，有话到我屋里去说。”哥哥把她拉走了。我从后面追上去，质问道：“你说说，你有什么理由到我屋里来胡闹？”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生日你为什么不来？”昭和初期，芳子姐在日本是有名的“男装美人”，服装不用说，连讲话也全是男子用语。我吃惊地反驳说：“我可不知道你一年过几次生日，我看以过生日为名而骗取别人的东西并不那么光彩，趁早还是别干的好。”她听这话后特别生气，因触及到她的痛处，冷不防地过来用脚踢了我一下。

哥哥自然不知道刚才她用军刀打我的事情，我也没去向哥哥告状，所以哥哥刚才并没太生气。现在看到她用脚踢我就火了，把她拽开推到一边说：“你要干什么？”这时，大哥也回来了。芳子姐怕兄弟俩一起打她，自己吃亏，赶紧带着人溜了。大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走进屋，看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随口问道：“她来做什么？”“打架来了，因为她生日我没去，所以闹到家里来了，看，玻璃窗、玻璃柜！”大哥这才注意到里屋的样子，吃惊地问：“怎么，捣乱来了？打你了？”说着转身跑了出去。后来听佣人们讲，大哥拿了院里的门栓追到大门口，看到还没打着火的木炭汽车就要打，芳子姐吓得蹲在车座下一个劲儿地喊：“快开车！”，当时如果不是佣人们拼命抱着大哥劝：“快别生气了，那会把人打坏的！”的话，大哥非把她从车上拽下来不可。这时，幸亏车打着了火，芳子姐才溜走。

那时，她因吗啡中毒，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我搬到东单后的两年里，除了送日本朋友回国到大门口外很少出门，几乎天天呆在家，闭门看书或与几个常来的朋友聊聊天。不久，大嫂要回日本了。

国民党进了北京，这里成了“接收大员”的天下。北京比日本人统治时期还乱，没有一天能静下来过个好日子。物价飞涨、纸币根本不值钱，街上到处是买卖“大洋”的黑市。共产党就要进城的消息，使得人心更加慌乱。

就在这时，传来了芳子姐被逮捕送交审判的消息。不久，报纸上天天登载审判她时的消息，也有她在法庭上戏弄国民党法官的情景。一时芳子姐成了北京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

对于芳子姐的事情，大哥出于兄妹之情，自然不能不管。他千方百计托人为芳子姐送去日用品，我们新搬的家在东单西观音寺胡同，不远就是东观音寺胡同，里面有日本人居留民委员会，住有日本和尚。国民党时期，还有一些日本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作为留用人员住在北京。

在那动荡的日子里，有一天，报上突然登出了“汉奸金璧辉被判死刑”的消息。金璧辉是川岛芳子为自己起的中国名。我记得那是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事情。不过，这只是初审判决，后又进行了复审。复审同样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北京当时的小报每天都登载她在法庭的答辩和她在法庭如何侮辱法官的消息。她公然讲了许多国民党的坏话，使民众很开心。

大哥非常担心，整天在外奔波，为她的事情想尽了办法。

我们的新家原先是一位日本牙科医生的诊所，后面有一间仓库，不知是放什么东西的。我们是经一位比较要好的医生介绍搬进来的。因曾是日本人的住宅，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当时，国民党对凡是日本人住过的院落都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有一次，门外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老保姆和孩子们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面如土色，全都跑到我的屋子里来了，一个劲儿地说：“怕！怕！怎么办？”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谁也不知道。敲门声越来越响，只听得四、五个男人在外面不知喊些什么。那时，常有国民党兵闯进民宅干坏事，今天哥哥不在，万一他们闯进来，日本嫂子出点什么意外的话就糟了。想到这里，我鼓足勇气，走到院子里隔着厚厚的门板问道：“有什么事啊？”对方好像是当兵的，只是一个劲儿地用枪托砸门，并不答话。我大声地喊到：“问你们话呢，听到没有？到底有什么事？”对方冷不防喝道：“开门，快开门！再不开门，我们就砸了！”“这扇门开不了。不信你从送信孔往里看看，这里堆着这么多煤，怎么开呀！有事的话，请到后门去。”他们交替着从送信孔往里看了看，不知嘀咕了些什么，因是湖南方言，我一句也没听懂。过了一会儿，他们走了。这下后门要遭殃了。我赶紧跑到佣人的屋里，让大家做好准备。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也好跟他们拼命。不知为什么，等了半天，他们没有再来。

在这之间，我们决定送嫂子回日本，四个孩子交给我代为照管。哥哥这时也正好要随贸易团去香港。那些日子真是忙得稀里糊涂，没一天安定日子。

一九四八年三月末的一天，报上又登出了“金璧辉已于今

晨六时四十分在北京第一监狱就地正法”的消息，上面还有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我看着芳子姐倒在地上的照片，产生一种说不出是什么样的心情。不过，坦白地讲，我没流一滴眼泪。我甚至觉得，这样的结局很适合于她。

后来，我听说哥哥将她死后的处理工作委托给北京东观音寺的一位日本和尚来办。

不久，我们从朋友C先生那里，看到了两张照片，这是芳子姐被枪决后拍的现场照片。一张是她被枪决后扑倒在地上的照片，所以只能从她的长发辨认出是个女人，但的确是她本人。另一张是她用日文写给川岛浪速的遗言。据说这两张照片是位外国记者拍的。听说她在监狱中中断了注射吗啡，头发也长长了，所以有人认为照片与过去的芳子印象不一样也并非毫无道理。这张从头部往下拍摄的照片，头发散乱，脸部看不清楚。但是，无论身体的形态，还是手脚的样子都肯定是芳子姐。当年她已年过四十，身体较之以前，多少有些发胖。金璧辉事件就此暂告一个段落。但是，没过两个月，芳子姐再次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被枪决的不是芳子而是她的替身”这一传言从何而起呢？原来在执行枪决时，不知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没有允许任何一个中国记者采访，现场只有美国记者，所以中国记者都很气愤。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们特意专门对“替身”之事进行了刻意宣传。因此，至今仍有人相信川岛芳子还活着。

日本留用人员撤退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以“接收”的名义，将大量日本人专用住宅及各机关的物品占为己有。自然，被指控为汉奸的人家也逃不过接收大员们的掠

夺。装满这些物品的大卡车、行李车在街头来来往往，乱糟糟一片。

自从国民党进了北京，到处都是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的官兵和美国兵。美军军官们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奸污妇女、打架斗殴、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是家常便饭。国民党对此视而不见，市民们的不满与日俱增。带着金丝框绿色眼镜的国民党军官多是些小个子的四川、湖南人，他们也一个个挎着舞女、妓女出入于舞厅、咖啡店、酒吧等处。手持短棒、头戴白色钢盔的美国宪兵耀武扬威，充斥街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北京的老百姓看到他们比日本兵还要横行霸道，非常失望。虽然在外面他们缄口不语，可回到家中没有一个人不骂的。当时的物价天天变，米面等主食一天三涨已经不足为奇了。货币一天变两、三次，到银行取钱得用麻袋去扛。人们私下纷纷议论：“国民党的日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这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洛克菲勒医院举行了会议。共产党进城的呼声日益高涨。

已将妻子送回日本的哥哥为了去香港，整日奔走于北京、天津之间。家中只有我和代代在我家的老保姆专心抚养着哥哥的四个孩子。

听说北京也将遭受空袭，所以到处人心惶惶，家中的老保姆终日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炸弹真的落到了南苑机场。顿时谣言四起，难辨真假。对于共产党，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也有人害怕，到处一片混乱。一次，老保姆很认真地问我“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是真的吗？”

北京的居民不仅得不到一日的安宁，而且天天要为一日三餐着急。昨天是金元券，今天是法币，明天又成了官金，货币天天变，物价天天涨，贫民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拼命挣扎。正月已近，但谁也无心过年，不知今后的命运如何。

“将来可怎么办？”几乎成了人们见面时的问候语。

在一片混乱中迎来了春节。正月的第二天，突然传来了共产党进城的消息。我那天不知为了什么事上街去了，正好碰到了进城的队伍。我一个人站在灯市口与八面槽的拐角处，夹在人群中欢迎分乘几百辆卡车进城的共产党军队。市民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卡车夹在军队的车队中。车上有个男人，挥着手、跺着脚使劲地高喊：“共产党万岁！”，这一场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道路的两侧站满了手持小红旗的群众，我非常奇怪这么多小红旗是什么时候做的。同时我也为共产党军人朴素的穿着感到震惊，见过日本军人、国民党军人和美国军人的我被共产党军人脚上的布鞋深深感动了。

此间，哥哥一直在办随贸易团去香港的手续。不久，手续终于办好了。在此之前，哥哥将一大笔钱交给一位外国人，托他给换成美元，但没想到那人的用人竟携款跑掉了。哥哥没办法，只好将留给我的钱带走了。我倒没很在意，不过，这件事给哥哥的打击好象不小。

临行前，哥哥拉着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流着泪对我说：“我最担心的是，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我没有落泪，只是说：“男子汉哭什么？你就放心去吧。只要我活着，绝不会让你的四个孩子饿死。”